

“儒分为八”别解

吴龙辉

关于孔子死后儒家由分裂而演变的情形，最著名的一种说法是战国末期韩非所提出的“儒分为八”说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云：

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谓真孔墨。孔墨不可复生，将谁使定世之学乎？

韩非生活于战国末世，曾师事儒林巨擘荀况，他对孔子以来儒家的演变情况应当是比较明瞭的。在这里，韩非先列出子张等八家的具体名目，然后又以“儒分为八”的统计数字予以总结。由此可知，“儒分为八”并非随意之论，更非韩非的杜撰，而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历史材料。

然而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，人们在对这条材料的理解上却似乎犯了一个错误。那就是：将儒分为八简单地理解为孔子死后儒家分裂成八个不同的思想派别。例如，郭沫若曾写过一篇《儒家八派的批判》，收录于《十批判书》中。我认为，将儒分为八等同为儒家八派是不恰当的。首先，从学术思想的倾向来看，在

韩非所提到的“八氏”中，子思、孟子、乐正子师承相接，前唱后和，实际上只能算作一派，这是有史可据而且尽人皆知的。其次，就现在所能见到的历史材料而言，韩非所提到的八氏也根本不能概括孔子死后儒家裂变的情况。例如，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所批判的“贱儒”共有“子张氏”、“子夏氏”、“子游氏”三家，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“子张氏”一家。郭沫若据康有为“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，传之子思，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”的说法^①，认为子思之儒、孟氏之儒、乐正氏之儒“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”；又说子夏乃三晋法家的先河，而韩非本人的思想属法家，所以《显学》对子夏氏避而不论。其武断穿凿之处，自不待言。而且，孔子弟子七十余人，开门授徒者甚众。除荀、韩所提到的子张等人之外，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所提到的率弟子“七十人”的曾参，与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所提到的“从弟子三百人，设取予去就”的澹台灭明等，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宗师。郭沫若虽然设法弥缝了《荀子》与《韩非子》的矛盾，但对曾参与澹台灭明等人又怎样解释呢？再次，即以韩非所提到的八家而论，其间时间先后相差甚远，最早的子张、子思等乃春秋末、战国初人，最晚的荀卿（即孙氏）、乐正克等乃战国末期人，将他们作为并列的思想流派而论，似乎不妥。因此，简单地将儒分为八作为对孔子死后儒家思想流派的总结，是讲不通的。

那么，韩非所讲的儒分为八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由于文献不足，世代遥远，要十分具体明确地说清这一问题，似乎不太容易。在此我只想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。我认为，韩非所提到的八氏，乃是孔子死后在孔门后学争正统的斗争中，先后涌现的以孔子真传自居的八大强家。

为了把问题说清楚，先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当时师弟子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形式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宗法制为基础而构成的社会。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切组织形式无不打上

了宗法关系的烙印。特别是在宗法制最为典型和鼎盛的周代，宗法关系已成为国家存在的形式，即所谓“国之本在家”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当时的教育形式也具有强烈的宗法色彩。师长与学生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家庭式的家长与子弟的关系。学生对师长必须恪守孝道，他们对师长的关系被称为“事”，即必须给师长服役。例如，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：

晋孙谈之子周，适周，事单襄公。立无跛，视无还（旋），
听无耸，言无远。

孙谈师事单襄公，其恭敬之态，有逾子侄。这也许就是学生被称为弟子并必须为师长服加隆之丧的原因。

孔子与群弟子之间所存在的正是这种家庭式的关系。弟子在进入孔门之时，必须承认孔子可以对自己履行家长式的权力。例如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

子路性鄙，好勇力，志伉直，冠雄鸡佩玃豚，陵暴孔子。孔子设礼，稍诱子路。子路后儒服委质，因门人请为弟子。

所谓委质，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云：“按服虔注《左氏》云：古者始仕，必先书其名于策，委死之质于君，然后为臣，示必死节于其君也。”即把自己的生死交给老师，如同宗法制下君臣关系一样。而且，孔门弟子在入门以后，必须克尽弟子的义务，晨昏定省，服其劳役。如冉求为季氏宰，退朝后先要向孔子请安。又子夏向孔子问孝，孔子回答说：

色难。有事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②

依此，则弟子不惟应当对先生尽外在的孝道，还必须具有内在的孝心。又颜回死，弟子违命厚葬之，孔子说：

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③

这都是弟子事师如父的例证。尤可注意的是，孔门弟子与师长之

间的家庭式关系还使孔门弟子的称呼带有家庭住宅色彩。例如，弟子又可称门人。门人者，门内之人也。孔子有时还用住宅中的位置比喻弟子与他的关系，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

子曰：“由之瑟，奚为于丘之门？”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“由也，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在这里，入门、升堂、入室，既是弟子学道由浅入深三个境界的比喻，也是弟子与孔子关系由浅入深三个层次的象征。这种将师弟子关系与家庭住宅联系的作法，子贡也有过一个比喻：

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。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，得其门者或寡矣。④

能否进入孔家的门墙，意味着能否学到孔子的思想。

孔子弟子在进入孔门以后，实际上组成了一个以孔子为宗师和家长的大家族，即“孔氏之儒”。孔门弟子都可算作这个家族中的一员，《论语·宪问》载：

子路宿于石门。晨门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
子路自鲁外出，借宿石门。守门人查其户口，子路答以孔氏，即是以孔家人自居。又同篇载：

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“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”

孔子客游于卫，与弟子住在一起，被人称为孔氏。这孔氏显然不是孔子一姓的血缘之家，乃是孔门弟子之家。孔子的弟子冉求和原思曾作过孔氏的家宰。孔子对弟子们的生活和生命要负家长的责任。如颜渊死，孔子负责对其安葬；公西华为孔子使于齐，孔子要给他母亲粮食；子路与高柴被孔子推荐在卫国为官，卫乱，孔子以家长式的态度为他们担心，说：“柴也其来，由也其死。”说“来”而不说“生”，则知高柴仕途不利后必归孔子身边。可

见，孔门弟子（特别是来源于鲁国之外的弟子）在生活上对孔子有着极大的依赖关系。当然，由于孔子弟子师事孔子的最深动机是为了入仕干禄，孔子对弟子所负责任主要不在于生活方面。而在于政治前途方面。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让弟子求得一官半职^⑤。

孔子去世以后，随着孔门弟子潜在的利害冲突表面化，以宗法原则组成的孔氏之儒无法继续存在下去。孔门高第各率其门徒相互独立。《荀子》所说的子张氏之儒、子夏氏之儒、子游氏之儒以及我据《史记》、《孟子》而指出的曾氏之儒、澹台氏之儒等，都是这一独立运动的产物。这些儒家为了争得正宗地位，曾相互攻击对方的观点不符合孔子的原意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在《韩非子·显学》中，上述诸家却只有子张氏列入八家之首，其他各家根本未被提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的看法是，在孔子死而七十子尚存的时代，孔氏之儒的家庭式集团形式虽不存在，但孔门弟子每年祭祀先师孔子的时候，为了顾全同门之谊，仍然采取集支共祭的方式。即是说，他们在宗法名义上仍然属于一个家族。然而，子张氏之儒却是一个例外。据《论语·子张》篇所载，在孔子高第中，子张是和其他弟子关系处得最差的一位。子游说：

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。然而未仁。

子游说子张难能而未仁，其意思是说子张自视甚高，不把同门放在眼里。从子张对子夏论交的故意抬杠来看，子张大概是极易攻击同门的。因此，孔门其他弟子都对他心存芥蒂，不乐与之为伍。曾参对此说得十分明白：“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”曾参在孔门中以善能动心忍性，乃至愚忠愚孝著称。他都对子张不能忍受，则其他弟子就更为可知了。既然其他同门觉得无法和子张相处（即并为仁），而子张又生性自高，那么，他就只能采取宗法制下“别族”的方式与其他弟子分裂了。何谓别族？《国语·晋语九》载：

智宣子将以瑶为后，智果曰：“不如宵也。”宣子曰：

“宵也恨”对曰：“宵之恨在面，瑶之恨在心。心恨败国，面恨不害。……若果立瑶也，智宗必灭。”弗听。

智果别族于太史，为辅氏。及智氏之亡也，唯辅果在。智果本为智氏家族的一员，由于不满意宗主荀甲（即宣子）选定智瑶为继承人，遂与智氏断绝家族关系，自立为辅氏家族，以免玉石俱焚的命运。此即别族。

我以别族类比子张与孔门其他弟子的关系，并非凭空杜撰，而可以用墨家为旁证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篇在提到儒分为八的同时，还提到墨离为三。《庄子·天下》篇对此有一评述：

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墨经，而倍谲不同，相谓别墨。墨家后学相里勤的弟子五侯与南方墨者苦获等人分了家，彼此攻击对方为别墨。所谓别墨者，即从墨家本宗中别族而出的旁枝偏系，与正宗嫡传相对。墨家弟子互称别墨，则子张与其他弟子的关系也应如此。

子张氏之儒从儒家大宗分离出去以后，儒家内部不同弟子间的利害冲突并未因此而消除。不同弟子间为了提高社会声望而引起的正宗之争依然存在。继孔门一传弟子子张之后，孔门再传弟子中的子思又一次从儒家中分裂出来。子思名伋，乃孔子的孙子，其父孔鲤先孔子而去世。子思之儒之所以继子张以后率先成为一家，与子思的身世有着重要关系。由于子思是孔子的嫡孙，孔子弟子一般都对比较尊敬，当时各国统治者对他也比对一般孔门后学更见重视。在伪书《孔丛子》^⑥中，子思之师曾参与子曾申实际自居于子思的从属地位，当时各国之君大夫因他是圣人之后而常常向他征询意见。在这种环境之下，子思氏之儒自然也就堂而皇之地以孔子的正宗嫡传自居了。《子思子·记问》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夫子闲居，喟然而叹。子思再拜请曰：“意子孙不修，

将忝祖乎？美尧舜之道，恨不及乎？”夫子曰：“尔孺子安知吾志？”子思对曰：“伋于进膳，亟闻夫子之教：‘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负荷，是谓不肖。’伋每思之，所以大恐而不懈也。”

夫子忻然笑曰：“然乎？吾无忧矣。世不废业，其克昌乎？”

孔子在世时所看重的接班人是短命的颜渊，对儿子孔鲤并不比一般弟子特殊，《论语·季氏》载陈亢向孔鲤探异闻，他得到的结果是“闻君子之远其子也”。然而，在这个故事中，孔子却为担心子孙能否世业“喟然而叹”，直到听到子思为继承祖业“大恐而不懈”的表白才转忧为喜。不言而喻，这一故事乃子思氏之儒为表明自己的正宗地位而使出的谋略。《子思子·居卫》篇所载的另一故事，更为明显地反映了子思以孔子继承人自居的事实：

曾子谓子思曰：“昔者吾从夫子游于诸侯。夫子未尝失人臣之礼，而犹圣道不行。今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，无乃不容乎？”子思曰：“时移世异，各有宜也。当吾先君，周制虽毁，君臣固位，上下相持若一体然。夫欲行其道，不执礼以求之，则不能入也。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，竞招英雄以自辅翼。此乃得士则昌，失士则亡之秋也。伋于此时不自高，人将下吾；不自贵，人将贱吾。舜禹揖让，汤武用师，非故相诡，乃各时也。”

子思宣称，他之所以对世主采取与先君孔子不同的态度，乃时移世异使然。从语气中可见他是以孔子传人自居的。

子思氏之儒凭着与孔子的血缘关系而自居为孔门正宗，这显然违背了孔子传贤不传子的初衷，自然会进一步激化孔门之徒正宗之争的矛盾。颜氏之儒大概即因此而起。颜氏之儒的祖师为颜渊，颜渊先孔子而死，因此，独立的颜氏之儒不可能由颜渊创建，只能由其后学完成。

孔子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有过把弟子中他认为唯一好学的颜渊培养为继承人的考虑。从《论语》可以看出，孔子所给颜渊的评价是其他弟子所不敢企望的。孔子不但屡次宣称颜渊是他弟子中真正的好学者，而且还认为颜渊是弟子中唯一的仁者，即所谓“回也，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^⑦他甚至当着其他弟子明确地将颜回与自己相提并论。《论语·述而》：

“子谓颜渊曰：‘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！’”可见，孔子在有意将颜渊树立为一个高出弟子一等的形象。而且，他还要其他弟子承认这一事实。《论语·公治长》载：

子谓子贡曰：“女与回也孰愈？”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！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子曰：“弗如也！吾与女弗如也。”

在孔门中，子贡以聪明能干而享有很高的声望。鲁国贵族叔孙武叔曾在朝廷宣言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孔子另一弟子陈亢也对子贡说过：“子为恭也，仲尼岂贤于子乎？”^⑧因此，子贡的表态在孔门中是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。孔子不仅同意子贡对颜渊的推崇，而且表示自己也不如颜渊，则他希望弟子在他死后师事颜渊之意可谓昭然若揭的了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以求行道，在陈、蔡之地受到当地保守贵族的围攻，处境极为危险，弟子都忍不住内心的愤怒。于是，孔子以《诗经·小雅·何草不黄》篇所描写的那种非兕非虎却徘徊在旷野中的小动物自比，分别让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三人对他的处境发表看法。子路怀疑孔子修道未够仁、智，所以别人不信任；子贡认为孔子之道过大，应当降低标准以迎合世俗统治者；而颜渊则认为孔子之道至大，世俗统治者本来就不可能容纳，他并且进一步指出，不容于世正是孔子伟大光明之所在，它体现的不是孔子的耻辱，而恰恰是世俗统治者的耻辱。孔子对子路、子贡的看法予以了批评，而对颜渊独加赞赏，说：“有是

哉？颜氏之子！使尔多财，吾为尔宰。”不管这个故事是否出自孔门后学的虚构与加工，我认为它至少有一点符合历史真实的，这就是：在孔子看来，唯有颜渊才是他真正的理解者。尤可注意的是“使尔多财，吾为尔宰”一句。古代的儒者为了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，对孔子甘为弟子家宰的表示在心理上不能接受，认为“此二句，似非夫子之言。”^⑨整段叙述可以接受，偏偏对其中二句凭空置疑，似无道理。我认为，这二句所表示的即是孔子希望颜渊能成为继他之后的儒门宗师之意。就象孔子有冉求作家宰一样，孔子希望颜渊获得与他同样的地位。

孔子这种以颜渊为继承人的考虑，在颜渊死后表现得最为明显。《论语·先进》篇连着记载了如下三条材料：

颜渊死。子曰：“噫！天丧予！天丧予！”

颜渊死。子哭之恸。从者曰：“子恸矣。”曰：“有恸乎？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！”

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不可。”门人厚葬之。

子曰：“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回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”

颜渊先孔子而逝，孔子认为这是“天丧予”，以致哀伤过度，恸不自知。古来儒者对“天丧予”有多种解释。我比较同意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的看法：“悼道无传，若天丧己也。”正因为孔子把颜渊作为他行道事业的继承者，作为他精神生命的延续，所以，颜渊的死也即意味着孔子精神生命的终结。他对颜渊的恸哭，除了哭颜渊以外，也有哭自己的成分，否则，他也不会说“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”了。也许正因为颜渊具有这样一种特殊身分，孔门弟子才不顾孔子的劝阻而对他予以厚葬。

由于颜渊在孔门中有这一特殊地位，其弟子自然认为他们才是孔子的正宗嫡传。因此，当子思氏之儒以孔门正宗自居以后，他们自然要起而相争，另立门户。

孟氏之儒的创始人为孟轲。据《孔丛子·杂训》篇载，孟轲（文中称孟子车，子车盖轲字）幼时“请见子思，子思见之，甚悦其志，命子上（子思之子）侍坐焉，礼敬子车甚崇，”结果子上很不高兴。由此来看，孟轲可能与子思的继承人子上等很不相能。因此，在他后来成名以后，便宣称自己才是孔子和子思的真传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的道统说大概即为此而发：

孟子曰：“由尧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，若禹、皋陶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，若伊尹、莱朱则见而知之；若文王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由孔子而来至于今，百有余岁，去圣人之世，若此其未远也；近圣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，然而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。”

在孔子与孟子之间，孔门弟子师徒相传，蔚为显学，传孔子之学者不可谓无人，然而却都被孟子一笔抹杀。然则孟氏之儒以孔门正宗自居之心，真乃路人皆知了。

漆雕氏之儒当在孟子之后。在孔门弟子中，以漆雕为姓者有三，郭沫若袭梁启超说，将漆雕氏之儒的创立者定为漆雕开。我认为，漆雕开只可看作漆雕氏之儒的祖师，但并非真正的创立者。创立漆雕氏之儒的人乃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漆雕子》十二篇的作者——漆雕开的后人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《漆雕子》一书之下有一条原注：“孔子弟子漆雕启（即漆雕开）后。”

仲良氏之儒亦在孟子之后。郭沫若袭梁启超之说，以仲良为孟子之前的楚国儒者陈良。我认为这是不对的。仲良氏的创立者当为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毛传》所提到的仲梁子。陈奇猷对此有一段可取的考述：

良，迂评本（《韩非子》）亦作梁，字同。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中上有仲梁子，但列与齐襄王（起纪元前二八二）

同时，而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、即齐威王七年（纪元前三七二），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、即齐湣王三十五年（纪元前二八九），孟子卒年下距襄王即位六年之久。考《古今人表》之体例，凡列某人与某王同时，必为生于某王之时（如孟子列与齐威王同时，则孟子生于齐威王七年即其例。），是仲梁子生于襄王之时，未及见孟子，故梁氏谓仲梁子即孟子所称之陈良，未确。《小戴礼记·檀弓上篇》：“曾子曰：尸未设饰，故帷堂小敛而彻帷。仲梁子曰：‘夫妇方乱，故帷堂小敛而彻帷。’”据此可得二事：第一，《小戴记》为汉人所辑，采有各家解礼之说，而此条之文亦显见其为注释曾子之语，当非与曾子同时，与上所说仲梁子在孟子后无冲突。第二，《小戴礼》虽引仲梁氏说仅此一条，然可知其为传曾子之学者。《诗·定之方中》毛《传》引仲梁子语，则仲梁子亦传《诗》，毛《诗》源自子夏，然则仲梁子乃兼有曾子、子夏二家之学派，郑注《檀弓》云：“仲梁子，鲁人。”又案：《左传》定五年有仲梁怀，盖其先也。（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卷第十九）

孙氏之儒创于荀况。荀况又称孙卿。他也是一位以儒家正宗自居的儒者。在《荀子》一书中，他多次强调自己独得仲尼、子弓的真传，对其他儒者予以全盘否定。乐正氏之儒创于孟子弟子乐正克，与荀况均为战国末期人。二家的年代不会早于仲梁氏。

总而言之，《韩非子·显学》所说的儒门八氏，既不足反映孔子死后儒家分裂演变的全貌，也不能看作因思想差异而自然形成的学术派别，他们只是作为显学的儒家内部先后出现的最有势力的几个宗派，即显学中的显学。无论八儒也好，还是三墨也好，它们出现的根源都是为了争得所谓“真孔、墨”的地位。

注：

①康有为《孟子微序》。

②《论语·为政》。

③《论语·先进》。

④⑧《论语·子张》。

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，可参阅拙文《儒家诞生的社会根源新探》，载《文献》1993年第2期。

⑥《孔丛子》旧题汉孔鲋撰，因不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，古人多疑为伪书。但书虽伪而材料不尽伪，仍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⑦《论语·雍也》。

⑨孙志祖语，转引自《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》卷四十七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